

打開中國傳統醫學的結

—「中國傳統醫學史」自序

醫十一屆 陳勝崑

研究中國科學技術史的人，總會被問一個問題：「現代科學為何單單發生在歐洲，而不是中國或其他地方？」的確，這是一個世界性的歷史大問題，一定要全盤對中、西社會、文化、思想、宗教、地理、氣候及心理形態等等從事大規模的比較之後，才有能力回答這個大問題。這個問題對我們中國人尤其重要，因為近百年來中國的種種苦難大多源自科學的落後，科學落後的原因在於中國傳統社會並沒有提供發展現代科學的土壤，筆者並沒有能力試圖去解這個謎，只是近年來沈湎於中國傳統醫學與現代醫學的探索中，希望可以藉醫學或是中國人對抗死亡與痛苦的戰鬥歷史中，得到一些心得與經驗，盼能藉歷史的研究，對我們醫學界的現代化及國家社會的科學化有所助益。

探討近代西方科學興起的原因，大概可粗劃為兩大主流：即內在分析論（Internalism）與外在分析論（Externalism）。內在論者側重科學觀念的內在變遷，強調科學家獨立創造的特質，他們強調天才的重要，認為擁有特殊智力和創造力的天才科學家的共同努力，往往可以造成科學躍進式的、突破性的發展，特別是天才群（Genius cluster）的出現，即蔚為偉大的科學時代，沒有天才的科學發展史，一定相當平板而迂緩的。

如果根據內在論者的理論，來看中國科學技術發展史的話，我們會發現中國歷代有很多優秀而思想前進的科學家，但是都無法形成風氣，以對科學模式（Paradigm）有重大的革新，主要在於中國傳統的科學家都是「孤立的天才」：科學革命家王充死了，他的思想就絕響；解剖學家王清任死了，中國傳統解剖學也幾乎絕響；地理學家徐霞客死了，旅行探險的風氣提倡不起來，這些事實，都在告訴我們，中國的天才是孤立式的、彗星式的。

外在論者強調科學思想與科學技術發展的社會環境，他們重視兩個主要因素：一為願意接受新觀念的社會文化環境，一為需求新知識的一種政治性經濟。這是十六世紀以來，西方近代科學高度發展的兩個主要外在條件。「外在需要」，不僅是科學高度發展的動力，而且決定了科學發展的方向。因為科學不能脫離實用性而孤立存在，創造發明的人，常受到他那個時代人們所重視方向的影響，才引發出他的創造能力，牛頓很自然地注意於天文學，因為那是他那個時代的主要課題，也是歐洲長久以來，人們一直努力想法子找出航海中辨清方向的正確方法，因為這些實用、外在的需求，造成牛頓偉大時代的來臨。

外在論也可以解釋中國科技史的若干現象，宋、元的數學家在「天元術」、「四元術」、高次方程的數值解法、級數求和、招差法等方面都有重要成就，但到了明朝就有戛然而止，後繼無人的現象。主要的原因是宋、元數學的發展嚴重地脫離了當時的社會需要，以天元術為例，我們只是在沙克什的「河防通議」（1321年）中看到它在水利方面的實際應用，但也只是二次方程並且是僅見的孤例；高次方程的數值解法，在「授時曆」的推算過程中曾用到四次方程，此外也就很難再找到其他有實際意義的例題是需要求解四次或四次以上方程了，至於多元的高次方程，那就更加脫離實際。外在社會沒有這方面的需求，這門學問只有漸漸萎縮了。

中國社會確有潛在足以阻礙近代科學技術發展的因素，這因素大抵是西方學者所說的「亞洲型態的官僚制度」，這官僚制度早期有助於科技的發展，到後來却阻礙近代科技在中國的興起（參見李約瑟著 *The Grand Titration*

）。因為這官僚制度及中國人的思想十分輕視商人，社會地位依士、農、工、商來排列的話，商人的地位是最低的。而近代科學史家的研究證明商人勢力的興起與現代科學的發展有重大的關係，商人必須十分關心他所買賣東西的內容與品質，也就是說商人一定要精確了解商品是那種重量、適用於什麼、用那種尺度和大小、需要什麼容器等等，自然會產生對事物「數量化」的要求。而中國科學最大的缺點是沒有「數量化」，以致伽利略式的科學革命不會誕生在中國，以致無法發現宇宙普遍之原則，所以其科學模式完全是達芬奇（Leonardo da Vinci）式的，易落入玄學的深淵，如中國傑出科學家沈括對溶液沈澱的化學反應觀察是十分出色的，他沒有朝數量化的方向去研究，硬要以陰陽五行的玄學理論來解釋，以致不能自拔，否則以沈括的才華，當中國的伽利略何難之有？問題在於他沒有把上層的數學化趨勢與下層的工匠之技結合而已。

商人重視的還有運輸與爭取時效，重商主義的興起，使歐洲人對海船的結構與海運的效率有十足的興趣，商人無疑地更帶來資本主義的萌芽，而直接、間接促成了歐洲的文藝復興、工業革命與宗教改革。

中國的「亞洲型態的官僚制度」是由一群無世襲性的菁英官員來控制著廣大而相當自主性的農村社會，朝廷、貴族和官僚們所扮演的角色僅為利用農業社會的特質而進行課徵賦稅而已，清明或經濟充裕的朝廷會興修水利或在各地設立平民醫官，或是編撰官方藥典。至於司法的作為則表現在兩方面：(1)它組織了國土領域的防衛力量，無論是遠古的中國封建社會，或是日後中華大帝國都是如此。(2)它組織了整個社會的架構和維持公共工作的延續，在不和整個中國歷史矛盾的條件下，後者的重要性，要大於前者，而後者工作的重點在於水利工程的興建及一般農業政策指導，對於破壞整個社會架構平衡的科技發明及商業行為，政府是不大歡迎的。

在中國歷史上被譽為最好的管理政府，是對社會事件干涉愈少的政府，中國傳統家庭的爭執都由自己內部解決而不依賴法庭；中國傳統的科學家也在這種最不受干涉的自然情況下收集力量的來源，並予以利用，所以中國有

風地動儀、鑄鐵和水力機的發明，這種與自然平衡而不干涉、破壞的主義，可說是建立中國自然科學的開端，所以中國人可以發現自然界潮汐的現象、太陽黑子、復磁性原理及全球植物觀測學中礦脈和樹林間互相關係，但是中國並沒有從這些科學革命前驅的研究活動及成果中，進一步去引發科學的革命，以促成近代科學的興起，因為中國受到不干涉主義與抑商思想的影響。但是中國的科學發展並沒有因而「退化」下來，「退化」一詞是純西方史學對中國科技歷史的錯誤觀念，我們縱觀整個中國科技史，一個延續不斷的科學化進步，證明傳統的中國社會是存在的，中國甚至沒有歐洲史上所謂的「黑暗時代」，其科技發展是穩重的，而不是西方式的突破、躍進。

中國傳統醫學的發展史也跟傳統政府組織有密切的關係，中國類似醫院的組織最遲在漢朝元始二年（西元2年）就已經有了。那年黃河一帶發生旱災，瘟疫流行，皇帝劉行設置場所，召醫生準備藥物，免費給老百姓治病，這很可能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公立的臨時防疫醫院（漢書平帝本紀）。到延熹五年（西元162年）皇甫規被提升做中郎將，率兵在甘肅隴坻一帶作戰，適逢軍隊裏疫病流行，死亡率高達百分之三十至四十多，皇甫規便租賃大批民房，設置醫藥，把病人集中起來治療，他自己每一天去看士兵的病，得到全軍的熱愛，當時軍隊中的這種醫療組織，叫做「庵廬」，好像今天的野戰醫院（後漢書皇甫規傳）。

南齊永明九年（西元491年）吳興一帶大水，疫病流行，竟陵王蕭把自己住宅拿出來，設置醫藥，收養貧病，這很可能是私立慈善醫院的最早形式（南齊書列傳第二十一）。北魏太和二十一年（西元497年）孝文帝（元宏）曾在洛陽設立「別坊」，派遣四個醫生，凡是貧窮害病的，都可以在這裏就醫。永年三年（西元510年）南安王（拓跋余）命令他的太常官選擇適中的地方，派遣醫生，備辦藥物，凡有疾病者皆可住在裏面，這可能是公立慈善醫院的最初形式（魏書太祖本紀、世宗本紀）。

唐代的醫院，都叫做「病坊」，大多是設在廟宇裏的，宋代醫院規模逐漸擴大，元祐四年（西元1089年），蘇東坡在杭州做官，捐了五十兩私帑，和公家的經費合起來辦一所病坊，名叫「安樂坊」，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公私合辦的醫院（馬輝清波別志），以後各州縣都設有醫院，也叫做「安樂坊」。元朝、明朝時幾乎各縣郡都成立官辦的「惠民藥局」，嘉惠民衆不少。

但是中國的傳統醫學終不能蛻變成今日的醫學，現代醫學幾乎是西方醫學的代名詞，在中國傳統封建思想影響之下，認為身體膚髮，受之父母，不得毀傷，就是死亡，也須保全全屍，絕對禁止人體解剖之研究，因此對人體的組織、系統、生理、機能缺乏實際的認識，祇有憑空揣測和想像，而影響到對疾病的了解，這是中國傳統醫學的最大致命傷。另外中國沒有長期醫學院的設置，以供醫者互相研究，太醫院的組織似是純為皇室服務而不是研究機關，不若意大利有 Padua 大學醫院成立六百五十年間，不知培養多少醫學人材。總之目前中國醫學離世界先進國家的水準還很遠，有待我們這一代的努力，不論是往尖峯醫學也好，回過頭來整理傳統醫學也好，都有助我們醫學水準之提高，癥結在於研究者必須有完整而現代的醫學訓練。

我讀別人的著作時，最喜歡先看序文，因為序文會告訴我們作者的思想及內容大概，帶有傳記性的序文更可以使我們了解這一部書和這一種主張的由來，從而判定它們在歷史上佔有的地位。我自己的著作現在要出版了，也想借這個自序來寫成一部份的自傳，說明我何以經現代醫學的訓練而回過頭來探索中國古典醫學的心路歷程，也可以作為現代中國年輕醫生縮影的描述。

我是民國四十年誕生在台灣雲林縣北港鎮的，北港以前是通大陸的重要海港，後來經滄海桑田的變化，在我出生時連港口的影子都看不出來了，所幸它還維持個名聞全省的媽祖廟，扮著「宗教都市」的角色，而繼續它的繁榮，我的父親在二次世界大戰末期正在日本學醫，祖父因為

家中經濟愈形窘迫，便把他召回家鄉開業了，父親因此以未能繼續深造而深感遺憾，不過他終於成了北港的一位盛名而成功的開業醫，基於他個人的遭遇，希望他的兩個兒子都能在尖峯醫學有所成就，在這種盼望下，我跟大哥、大姊在幼年時，就被送到台南這個大城去讀書。

台南是個古風質樸的城市，那時候升學惡補之風正盛，我被送進了以升學率出名的永福國小（九年國教實施之後，此校轉以音樂、美術、柔道出名，可惜我無緣享受），接受填鴨式的教育，每天早出晚歸，有作不完的功課，那時候却對這種生活方式起了很大的反感，僅有的一、兩堂音樂、美術等與升學無關的課，像沙漠中的綠洲般，是我片段快樂的時光；我們教室的四周擺了許多課外書，是擺給督學看的，不准我們看，不過因為求知慾望下，我曾在老師不在時，把那些書通通看完，思想倒也開通不少，對自然的觀察、文學的欣賞也都有濃厚的興趣，可惜老師認為這種東西與研究升學無關，經常有意無意地省略，像這樣的教員在校長、家長的壓力下，每天只能機械地賣學問，或賺一點補習費，倒也是一種悲哀。升上初中之後，情形好多了，我們有較多的時間可以遊戲或運動，尤其李仲篋先生當了我們的導師以後，我們全班像兄弟般親密，李先生經常跟我們談人生哲學與世界局勢，那時候的我很喜歡聽他講話，而且把他列為崇拜對象。在我畢業之後至今的十餘年間，每過台南我必再找他，雖然他現在不再跟我談深入的問題了，但他對我的啟蒙，我終始不能忘。

高中來台北之後，實在不能適應這邊的生活，一方面因高中的老師不像台南初中老師的認真、熱忱與人情味，一方面在台北寄人籬下，有吐不出氣的感覺。有位鄧熾敦同學，每天由中壢趕來台北通學，他就坐在我的旁邊，他有多方面的興趣，經常跟我談天文、音樂、數學等方面的事，有空還一起跑到西門町看電影或到牯嶺街看舊書，漸漸地培養對人、對事自己獨特的看法。

考入台北近郊一所私立醫學院醫科，我自己並沒有很失望，因為我知道自己的成績只能及於此，而且不願再啃那些升學書，只有安心地讀下去，這所醫學院年齡尚小，是沒有什麼風氣，但幾位學長則深有人文素養，他們在這

裏努力地把歷史、社會學、音樂和醫學結合起來，推行「醫學人文」風氣，所幸地我沾到這風氣的邊，頓時覺得醫學的內涵突然活潑起來，而不是課堂老師所表現醫學理論的唯物論與機械論，絲毫沒有人性與人情。這樣的教員滿眼皆是，他們是教醫學的，而醫學應是最有人性與人情味的科學，可是他們都無法以人類健康、幸福為理想，而只注意於某些病症的臨床表現與實驗數據，或許在他們的心目中，一位病人與一隻實驗的天竺鼠沒有兩樣吧！我在那裏沒有遇到胸襟廣闊的偉大醫學家，倒是幾位病理學的老師令我十分感動，他們數十年的光陰都拋在專業的研究上，嚴謹而深沈地建立他們學問的樂趣與權威。

我的中國醫學史興趣在這時候慢慢培養出來，因為我自小就喜歡讀歷史書，恰值李約瑟的巨著「中國之科學與文明」譯本發行，讀了李氏大著的序，曾感動好幾次，自己想想何不把自己的本行醫學與歷史結合起來，此易收事半功倍之效，洪傳岳學長供給我很多西方醫學史的知識與資料，我便可輕易地把方向指到中國醫學史來，以後學醫，讀到某某病，便經常聯想這個病在中國歷史所扮演的角色。

遇到與認識郭正昭先生是我這一生的轉捩點，在一個秋風蕭颯的夜晚，聽到他的演講之後，我跟林淵煌兄連夜去拜訪他，他有過人的體力，可以為我們講整個晚上，然後在隔天的清晨去近史所上班，使我與林兄大呼吃不消。郭先生去國四年，我們仍保持密切之連繫，這時候我的中國科技史乏人指導，只好順著李約瑟、戴內清等大師的遺著自己摸索下去，後來林兄轉至純醫學研究面，並至皮堡深造，只剩下我在台眷顧中國醫學史。這時候，蔡仁兄加入科技史研究之行列，他驚人的才華與文筆，真使中國科技史生色不少。

滿洲醫科大學出身的恩師那琦教授，是目前台灣醫藥的本草學者，他的熱情與驚人的記憶力，似乎使我回到二十、四十年前的滿州醫大與日籍學人的中國醫史大師龐田次、岡西為人等同遊，受其薰陶；由他的口中，方知滿洲醫科大學的中國醫籍研究室乃全世界藏中國醫書最豐富的地方，對這寶藏我目前只能心嚮往之。那教授又數度出國

對日本各大圖書館及美國國會圖書館、普林斯頓大學葛斯德東方圖書館之中國醫書都有相當之了解，但盼有日得以遠遊這些圖書館，以遂我多年之心願。

郭先生至美國專攻科技史，四年之後他回到台灣，我們相會於中研院近史所，使我既興奮又高興，之後的二年中我們有無數次的會談與秉燭夜遊，同時專攻數學史的洪萬生，氣象史的劉昭民、物理史的魯經邦、胡進銳等也都加入中國科技史討論的行列，彼此的見解雖不太成熟，但交換意見總會放出智慧的火花，達到科技整合的目的。郭先生滯留國內二年內，時有佳作發表，使台灣的科技史風氣又邁進了一大步，他的道德與修養亦為我們所共欽，我希望他再早日回台灣。

在我行醫過程中，我深信若沒有人文，就不可能有哲學，甚至不可能有良好的科學。一位傑出的科學家必定是位傑出的人文工作者，因為科學或醫學永不可能與社會脫離。作為一位醫學工作者，除了要歸納各種複雜的病症外，還要作無數次的量度（仔細地一次又一次的重覆，務求無誤），不厭其煩的計算，以及翻閱一切其他科學論著，這些工作都是無情地拒絕一切個人主觀意見的滲入科學研究，這些工作是相當枯燥，但也是任何日後思想馳騁的準備。我感謝在我這一生中，曾有數次這樣研究工作的機會，以奠定基礎，以使我日後的醫學史探索路程中，可以大膽地傾注於科學的美的成分——搜集事實，提出理論加以解釋，點滴地建立個人的史觀，再把結果用到社會，用到人文方面來；我始終沒辦法達到父親的要求去做一個純醫學研究者，這是我的個性使然，我實在不願我的醫學走得太唯物、太機械性，關注人的醫學總要有充份人性才好。

當筆者還是一個醫學生時，便經常四出訪問圖書館，以收集各種醫史材料，做為建立自己史觀的準備，可惜台灣地處海角一隅，又曾受日本統治多年，中國大陸發行的醫籍醫書、醫學期刊均不易見到。自十九世紀末年即發行的「博醫會誌」及「中華醫學雜誌」乃紀錄近代中國醫學史及疾病史的第一手文獻，筆者訪遍台灣各大小圖書館，僅在國防醫學院及台大醫學院找到零碎的這兩種雜誌，整套的這兩種雜誌可能海外才有，這是在台灣研究醫學史的

困難，我想其他學科的同志也一定有這項困擾，資料不足，是在台灣研究學問的最大瓶頸，本書未能充份應用海外資料，難免有挂一漏萬之處。

四年前，例行的一個寒假，曾走訪中央研究院的呂實強教授，承他的好意，把近史所一個空閒的房間暫供我看書，那時的我，沒有現實油米柴鹽的壓力，每日黎明即趕到那地方，像海綿一般，浸在古典科學技術資料的大海裏，確實大大地開了眼界，直到胡適公園的杜鵑花盛開，使杜鵑花築成的「胡」字照得滿天通紅時，我知道我必須回學校了，因為現代醫學在呼喚我，我的病人在呼喚我，我必須再踏出古典的象牙塔，像歷代中國的醫家般，去對付各種疾病與死亡，也就是要披上武器去應付現實社會的現實問題。我的朋友楊肅一醫師在他出國去學精神醫學以前，曾經語重心長地勸我要改讀精神醫學，因為他認為台灣受正式訓練的精神醫生太少，不足以應付社會的需要，他說我如果去當精神醫生，就可以讓三十個精神病人來住院，就可以解決部份社會問題，他對我的久久沈緬於古典醫學頗表不滿。事隔半年，我一直沒辦法當一位精神科醫生，去解決部份社會問題，這是我應該愧疚之處，但是醫學史或醫學文化、醫學思想的研究，對社會也是一種貢獻，只不過較間接，較含蓄罷了，就長遠來講，更是建設我們社會文化的動力，因為沒有一個社會可以拋棄它的傳統，要現代化就必須了解自己的傳統，我的理想是要了解我們醫學的傳統，使之迅速現代化。

日後，假我以時日，必定傾全力於中國疾病史的探討，中國歷代對付疾病的智慧與方法乃塑造中國文化的一磚一瓦，自有其歷史價值。以疾病史的眼光來看中國歷史的演化，其結果必將與以往用政治史、家族史的角度來分析或解釋歷史所得的圖片，完全異樣。用疾病史解釋人類歷史的首部巨著是麥尼爾（W. H. McNeill）教授的「瘟疫與人類」（Plaques and Peoples）這本書，此書以世界史的眼光，觀察歷史上的各種傳染病對人類歷史的步調所產生的衝擊；由傳染病的起源以及散播的因素，重新檢討在歷史學界早有定論的重大歷史事件，他舉例說明西元前430至429年之間雅典與斯巴達的爭奪地中海的霸權，

一般教科書多半把雅典被斯巴達打敗的原因，歸之於斯巴達實施軍事獨裁統治，具有事權專一、組織效率迅速、戰鬥力高昂等優點；可是麥教授却從史籍中，找到證據，證明雅典陸軍在這段時間，因為一場瘟疫而折損近乎四分之一的軍隊，由此知政制的不同，只是戰爭勝敗的一個因素而已，不能據此以解釋獨裁式的軍事統治就勝過城邦式的共和政治體系。他又由史料證明西班牙人當年入侵新大陸的同時，也將天花、麻疹、流行性感冒等病菌，散播給美洲印地安人，結果有很多部落便因此而滅族滅種，要不是如此，科特芝（Cortez）的六百人軍隊，也不可能一下子就征服人口上百萬的墨西哥原始住民阿芝特科（Aztec）大帝國。

麥教授這本是疾病史的權威之作，可惜限於語言及資料，他的觸角沒有辦法及於中國歷史及疾病史，就也要怪我們中國沒有醫史家潛心研究中國疾病史，以供放在世界疾病史中去關連研究，此正是筆者日後要注意中國疾病史的原因了。

鑑於目前中國醫界的嚴重缺乏歷史感，及中、西醫學的嚴重分裂與對立，我想只有訴諸中國傳統醫學的歷史研究才足以補足這個大遺憾，原因在於：

①傳統藥物及傳統診療方法有許多寶藏可以開採為現代醫家所用，其前提除研究者必須具備現代最新之醫學知識外，醫史學的知識是最重要的，因為唯有醫史學可以使我們明白中國歷代診療方法之演變及歷代對各種藥物的認識及使用，好好加以開採的話，自是不讓前北平協和醫學院陳克恢研究麻黃，造福人類，專美於前。

②現代醫家若注重醫史學，當可發現傳統文化內有許多優良品德，足以為今日之用。如中國歷代的醫家所涵養出一套中國傳統的醫學倫理學，適當而巧妙地安排醫生與病人之間的人際關係，而且積極地鼓勵醫生修養、道德與進修，這一套傳統文化孕育出來的醫學倫理學，似乎比移植西方的醫學倫理學更能適合我們的社會，筆者研讀傳統醫學倫理學時經常被歷代傑出醫家的一股悲天憫人之氣勢所懾服，所以我想在醫學院開中國醫史課程當有助醫生道德之培養。

③傳統醫家若注重醫史學，當知人類的醫學知識是進化的，人類對抗疾病的方法是經常更新的，今必勝古，是現代人應有的史觀，當不致於自私其醫術、藥方，也不致於自稱擁有某某古方，可專治今日之不治之症等等驚世駭俗之語，而應虛心地、誠心地接受今日科技之成就並有勇氣接受現代科學的嚴格訓練。

本書的內涵專論中國傳統的醫學與文化，至於西方近代醫學傳來中國之後，中國人運用西方醫學的成績及反響，在筆者之「近代醫學在中國」裏有詳細之討論，讀者可以參看，該書由當代醫學雜誌社印行，一九七八年出版。

本書寫作過程中，蒙吾友尹明潭、胡進銀、李俊年、劉逢吉等由海外收集珍貴資料，特予最大之謝意，另外中央圖書館、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近史所圖書館、台大醫學院、國防醫學院、台北醫學院、中國醫藥學院及中國醫藥研究所之給我閱讀之方便，也十分感謝。

最後感謝高信疆兄的促成出版！

附：本書後面有研究中國醫史之有關英文書目，它是由Bschi ffeler 所編。中文書目則附於「近代醫學在中國」一書後面，讀者可以查看。

陳勝崑 寫於台北市

民國六十八年三月

附：「中國傳統醫學史」一書於民國六十八年十月由時報文化出版公司出版。